

中国

传统文化通论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柯尊全

封扉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 / 赵洪恩 李宝席主编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01-003851-1

. 中... . 赵... 李... . 传统文化-中国-教材
.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3201号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

ZHONGGUO CHUANTONGWENHUA TONGLUN

赵洪恩 李宝席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70千字 印数：1-6000册

ISBN 7-01-003851-1 定价：26.00元

主 编	赵洪恩	李宝席		
副主编	付 礼	何 瑞	路海平	王永杰
	史广政	郭 青		
主编助理	孙富和	范艳存	魏 堃	赵 艳
撰稿人	赵洪恩	郭 青	杨长君	李 涛
	田 锋	路海平	孙宏义	牛敬业
	付 礼	孙富和	何 瑞	薛 颖
	高 乐	李宝席	齐那顺达来	
	王永杰	史广政	魏 堃	路本增
	赵 艳	赵 宏	谭华苓	宁 薇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化界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1)
第二节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6)
第三节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14)
第二章 历代文化	(21)
第一节 远古文化	(21)
第二节 夏商西周文化	(28)
第三节 春秋战国文化	(37)
第四节 秦汉文化	(47)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	(55)
第六节 隋唐文化	(63)
第七节 五代两宋文化	(71)
第八节 辽西夏金元文化	(80)
第九节 明清文化	(88)
第三章 专题文化	(97)
第一节 哲学文化	(97)

第二节	伦理文化	(110)
第三节	宗教文化	(123)
第四节	史学文化	(133)
第五节	语言与典籍文化	(147)
第六节	古典文学	(158)
第七节	传统艺术	(171)
第八节	科技文化	(189)
第九节	古代教育	(202)
第十节	政法文化	(214)
第十一节	军事文化	(230)
第十二节	生活习俗文化	(242)

第四章 地域文化

(258)

第一节	中原文化	(258)
第二节	齐鲁文化	(270)
第三节	荆楚文化	(280)
第四节	关中文化	(290)
第五节	晋文化	(300)
第六节	燕赵文化	(309)
第七节	吴越文化	(320)
第八节	巴蜀文化	(335)
第九节	岭南文化	(346)

第五章	民族文化	(363)
第一节	满族文化	(364)
第二节	蒙古族文化	(372)
第三节	回族文化	(379)
第四节	藏族文化	(385)
第五节	维吾尔族文化	(392)
第六节	壮族文化	(399)
第七节	苗族文化	(406)
第八节	彝族文化	(414)
第六章	综论	(42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的土壤	(42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和特征	(427)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435)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442)
第五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452)
第六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关系	(456)
第七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 future 走向	(463)
参考文献		(471)
后记		(478)

第一章 绪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四个古老文明摇篮中孕育产生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尚存的文化体系，是唯一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而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古典文化。在有文字可考的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勤劳智慧的祖先以其非凡的创造力，给我们留下极为丰硕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自身的成长、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素质教育的落实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具有深远意义。

本章作为绪论，将讨论文化界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等问题。

第一节 文化界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内涵是什么；而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必须首先界定作为它的种概念的“文化”范畴。

一、文化界说

人类社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最简单的东西往往又是最复杂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东西。狄德罗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每每注定是人们知道得很少的东西。“文化”这个概念就是如此。我们天天都在谈论文化，时时刻刻都在同文化打交道，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却是人们很难说清的问题。古今中外，学者们提出了成千上百个文化定义，但说来说去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本指“文治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举。《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被看做是“文化”的原始提法。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显然，“以文教化”之义十分明确。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如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晋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其义均不外乎文治教化，强调用伦理道德、诗书礼乐、典章制度等教化世人，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然而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与古代不尽一致，它是19世纪末期通过日文转译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其本义指耕作，后引申出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种含义。英文、法文的“文化”一词写作Culture，它们（包括德文的“文化”）都是从拉丁文Cultura演化来的。17世纪的德国学者S. 普芬多夫就曾对“文化”作过界定。他认为，文化是社

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19世纪中叶以后，一些新的人文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在西方兴起，这些学科均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和内容，“文化”一词逐步成为这些学科的重要术语。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E.B. Tyior），他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个定义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我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还有《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它将文化概念作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界定：“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广义的“文化”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的，其本质在于人的本质的外化、对象化或物化，即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其本质是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形态。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不同，“文

转引自王玉德等：《中国传统文化新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化”概念广狭的确定，应由研究的学科、内容而定。本书肯定和赞同中国广大学者上述广狭两种含义的“文化”概念，但基本上以狭义“文化”为论述范围，即主要探讨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

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本书赞同和采纳物质、制度、行为、观念四层面说。物质层面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化大厦的基石；制度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行为层面即人类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綢繆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本书探讨的“文化”，包括上述四个层面，重点则在观念层面。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大概念，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三个较小概念组合而成的。

国度性、民族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中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在先秦，中国指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段。早在上古时，华夏族（古汉族自称）建国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而将周边地区称为四方或四夷。《诗经》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秦汉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中央政权建立，“中国”的内涵随之拓展，但直至隋唐乃至以后，“中国”仍指定都中原的王朝。自元代开始，自称其统治所及的区域为中国，明清沿袭此称谓。中国版图在历史上多有伸缩，至清乾隆年间才大体奠定了现在的领土范围。

中华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它是中国境内由华夏族繁衍而来的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的总称。“中华”之得名有一历史过程。“中”，意居四方之中央。“华”，本意指光彩辉耀，用于族名，蕴含文明发达之意。“中华”意谓居于中央的文化昌明的民族。“中华”一词，出现于魏晋时期。《晋书·刘乔传》中记载：“今边陲天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说：“若使（亮）游步中华，聘其龙之，必不出曹操诸谋士之下。”“中华”是一个复合词，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境内各民族间联系纽带日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渐趋完备。至近代，整体意识、族群观念更加自觉，“中华民族”遂成为包括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共同称谓。

所谓“传统”，从文化社会学角度诠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逐代延续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等。至于“文化”，前已论及，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总是处于一种不断产生、又不断淘汰的过程中。因而，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都可称之为传统文化。而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才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成为后世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将这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因而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文化称之为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东西。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变易性。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一个很长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是指周秦至清中叶这三千多年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指从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东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指植根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态的东西，但又有动态的东西包含于其中，是过去与现在交融的过程，渗入了各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一些学者提出，“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各种程式化了的理论形态方面，而且更广泛地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非理论形态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封建时代的文化，而且包括近代文化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源上讲不是一源分流，而是殊途同归，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

综观上述观点，可见各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毕竟从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富有启发性。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从远古至清晚期以前这漫长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典文化，具体而言，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定义为：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

第二节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它在历史中形成，馈赠于后世，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它并不全是珠玑而是混有沙石。

因此，对这份遗产既不能完全抛弃，又不能全盘搬用，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取精用弘，批判地加以继承。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认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优越性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自明朝中期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渐渐落伍，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在西方炮舰的凌威和西方文化大量输入面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和缺陷暴露无遗。西方的强大，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西文化的明显差异，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前途产生了种种思索，形成的认识和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中体西用”说。“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体”，指事物的本体或根本；“用”，指作用或效用。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治国之本；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作为治国的辅助物。中体西用，就是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体，汲取西方科技文化为我所用。以“体”和“用”这对概念来概括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和弃取，毕竟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因而“中体西用”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科学命题。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王朝被日本击败，说明这个公式既没有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出路，也不可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种主张的失败，其根源之一就在于离开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土壤，单纯植入西方科学技术这一无根花木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激进思想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认为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国停滞和落后的根

源，应全面否定和彻底抛弃。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其代表人物陈独秀自己解释说，这实在是出于对“三纲五常”之类封建礼教的愤恨而提出的矫枉过正的言论。虽然这种言论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毕竟因其带有浓重的片面性而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相联系，陈序经、胡适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论。这种“全盘西化”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又曾喧嚣一时。他们不仅在文化上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而且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也主张全盘西化。一些人甚至提出“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方能走上现代化”的奇谈怪论。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传统可以扬弃、创新，却不可能任意割断、否定。“全盘西化”论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理论，它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害的，这种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无法生根。如果一个民族为了实现现代化，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统统加以抛弃，完全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胡适曾撰文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说自己主张的全盘西化就是文化的充分世界化。可是他忘记了一个基本道理——没有民族化也就没有世界化。民族化越是得到充分的发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融合才越容易得以实现。离开了民族化，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法则。毛泽东同志早在60多年前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第三，“保存国粹”和“儒学复兴”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守旧派文人与“打倒孔家店”相对抗，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第2版，第707页。

被称为“国粹派”。他们主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国粹”或“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无限制地扩大了，认为传统是不能移易的，实际成了“全盘继承”。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极端，说到底，这是一种抱残守缺的理论。它同全盘西化一样，都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思路，都无助于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鲁迅先生对此种倾向给予尖锐的讽刺道：“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美如乳酪’。”

在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讨论中，在当代文化热潮中，一些倡导“新儒学”的学者们提出“儒学复兴”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解决在于文化出路的解决，文化出路的根本解决又在于儒学的复兴。他们认为，只要抓住复兴儒学这个“根本”，就可以解决当代中国包括信仰危机、道德建设、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等在内的一切问题。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其不容否定的积极价值，但也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因而主张恢复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并用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而且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历史倒退。

第四，“西体中用”说。“西体中用”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的学者提出来的，完全的表述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西学为体，就是以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制度）作为治国之本或主体；中学为用，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辅助和补充。他们认为现代化是一

转引自温克勤等：《伦理学与道德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436页。

种“体”的根本变化，即把“中体”变为“西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可资利用的东西作为补充。很显然，这种“主体西化”论同“全盘西化”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差异只在有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附属物而已。

第五，“中西互为体用”说。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能由其中一家为“体”，另一家为“用”，而是二者均可作为“体”，亦均可作为“用”，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融合，通过“杂交”产生一种新文化。相对于上述几种片面观点，这种观点不可否认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免有折中调和的味道，因而也不是一个科学命题。

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兼收并蓄；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又不是“中西互为体用”，而是应该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对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8页。

中国传统文化应取的态度。

那么，怎样取精用弘进行批判地继承呢？即剔除哪些糟粕、吸收哪些精华呢？我们认为，需要剔除的糟粕主要有：

第一，复古保守。儒家的“克己复礼”就是典型表现。所谓“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变革是“礼崩乐坏”，他把恢复和完善从夏商特别是从西周沿续下来的礼制作为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面对着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他大声疾呼“吾从周”。西汉董仲舒承袭了孔孟复古保守思想，反对变革，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

第二，消极无为。道家学说中突出表现了消极无为、小国寡民思想和主张。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主张“无待、无己、无为、无虑”。清净无为的思想必然引申出“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主张。老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社会政治主张是封建社会末期以来闭关锁国政策的理论基础。

第三，纲常名教。董仲舒为在封建宗法家族制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提出“三纲五常”之说。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明理学家更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主张。这种封建的纲常名教是两千多年来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绳索，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沉重罗网。

第四，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更趋于极端，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则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儒家学说中的重义轻利思想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今更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

第五，重道轻器。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伦理政治型文化，重视修